

## 西南联大，我深深地怀念您！

○张道一（1943入学，外文）

张道一，1926年出生，云南鹤庆县人。1943年入西南联大外文系，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。1959年至1966年，担任彭真同志秘书。曾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。现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。

我是1943年秋季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迁到了昆明，我这家境并不富裕的人才有了机会进入名校。

西南联大可说是汇聚了全国最棒的教学阵容。以外文系来说，8年间共有过教授28人之多。现在人们熟悉的就有：钱钟书、朱光潜、冯至、闻家驊、陈嘉、柳无忌、叶公超、胡毅、吴宓等，还有两名外国人：温德（Robert Winter）和威廉·燕卜苏（William Empson）。联大外文系的第一位系主任是叶公超，后来曾任国民政



2012年11月3日，张道一学长（前排左3）出席纪念西南联大成立75周年大会，参加老校友与清华学生艺术团合唱《松花江上》和《毕业歌》，前左2为彭珮云学长

府的外交部长。我就读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，那是一位檀香山的华侨，早年就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，30年代是清华外文系的系主任，曾主编出版了《大学一年级英语课本》。我在大二时曾跟他学过英国散文和英诗。他高高的个子，一张让太阳染了色的脸，不知怎么总使我觉得他一定是位棒球运动员。他的口语非常流利、自然，他朗读Ben Johnson诗时的神态，现在还历历在目。

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，课程分必修和选修。同一门课，有几位先生开。我体会，这有助于学术自由和提高教学质量，也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。三、四年级的学生要修“莎士比亚（研究）”这门课，由吴宓、陈嘉和温德开，我选了陈先生的。吴宓先生在二三十年代就是文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了，是维护文言文、反对白话文的一位怪杰，主编《学衡》和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，连翻译西方名著也必用文言文，曾经受到鲁迅先生的抨击。我们在联大新校舍，见他一年四季穿一身蓝布长衫，低着头走路，一边走一边沉思的样子。我没有选他的课，也许是失算，错过了见识这位学贯中西、开比较文学先河、又是“红学”大师的机会。

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基础课的教学，基础课都安排教授讲课。学校把大一国文、大一英语、中国通史规定为全校的共同课，我很赞成。我认为，作为大学生，不

## □ 联大春秋

管念什么科、系，中文、中外文化历史知识都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平，以免“普通常识”欠缺。据统计，外文系派出教大一英文的就有10位教授之多。我上大一英文的老师是胡毅教授，胡先生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，解放后曾任河北师范学院院长。他的发音很纯正，我很庆幸在大一时就有这么好的老师领路。教我大一国文的是朱自清教授，朱先生还亲自给我批改过作文。西南联大注重把学生的基础打扎实，使我受益匪浅。

西南联大很注意开拓学生的知识面，规定人文科学的学生必须选一门自然科学的课，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的课。外文系的学生，在专业课之外，必须选一门自然科学和两门社会科学的课。我选过李继侗先生的“生物学”、陈岱孙先生的“经济学概论”、金岳霖先生的“逻辑”。我还上过冯友兰先生的“伦理学”，这是大一学生的共同必修课。我从陈岱孙先生处懂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，demand and supply(需求和供给)决定价格。陈先生在黑板上用坐标图演示这二者间的关系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从金岳霖先生处，我懂得了内涵和外延，大前提—小前提—结论(三段式)等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。

联大外文系的教学方针是要求学生熟读欧美文学名著，学习欣赏西方文化之精髓。系里开出英国戏剧、英国小说、英诗、英国散文等必读专业课。我除了陈福田开的英国散文和英诗外，还选了赵诏熊



2012年8月7日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会出席人员合影。左起：张文朴、方堃、潘际銮、李忠、沈克琦、李晓、张友仁、胡邦定、张道一、庞家驹、唐绍明、曾骥才

的“欧洲戏剧”，更选了温德的“但丁”等。我们虽然没有学过意大利语，但他的朗读使我们欣赏到了原作的韵味。他朗读完后再用英语讲解，妙趣横生。我在这里要特别提起“英国文学史”这门课，这门课是由李赋宁先生开的。李先生在1935年考取清华，在西南联大念完本科和研究生，1941年留校任教，作为青年教员开了这门课。联大当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，教室是茅草房不说，英国文学史这样重要的课竟没有教材。李先生自编讲义，我们只能当堂笔记。这门课使我第一次对英国作家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，内容非常吸引我。李先生出口成章，语速适中，我使用心地尽可能完整地记笔记。这本笔记，我在1946年复员到北大念四年级时随身带到了北平，那是用云南所产的“土纸”(类似“川连纸”、“高丽纸”)订成的。至今仍仍然珍藏着，算是对学生时代、对李先生的纪念吧。

联大外文系的教学，我以为是较偏向

于培养研究型人才的，不似现在外语教学注重学生的交际能力(特别是口语)。联大没有开设现在通行的口语课和听力课。为了适应给美军输送“翻译官”的任务，昆明曾开办过译员训练班，外文系也曾派出教师，外文系的学生也有应征的。但是，学生的听力和口语都得到相当的训练。这是因为，外文系教师的课，不论哪一门，一律用外语直接讲授。别的系的教师(包括工学院)，也有一些教授是用外语直接讲授的，至少也会在讲授中夹杂许多外语。联大教授中90%以上留学欧美，他们的外语口语语音纯正，给学生作了很好的示范。至于我自己，还曾经选修了袁家骅教授的“语音学”，从中懂得了英语发音的科学方法，受到了发音规范的训练，因此终生得益。袁先生在解放后专门从事我

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，曾帮助确定了壮族的标准语，创立了壮族文字。

西南联大把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的传统会聚于一身，形成了科学、民主、学术自由的学风，并继承了“五四”以来知识分子以国家、民族为重的思想政治传统，成为培养科学、学术精英的基地和反独裁、争取进步的“民主堡垒”。它在传授优秀中国文化的同时，也传授了优秀的西方文化。我在西南联大，不仅接受了它传输的知识，而且受到了政治思想的熏陶，积极参加了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和学生社团的活动。

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名校、名师对人的熏陶教育的力量。西南联大，我多么地怀念您，感谢您！

## 我的奋斗人生

○曾恭武（1944入学，中文）

我是云南省华坪县新庄乡人，自幼丧父，家庭贫苦，靠寡母煮酒喂猪抚育读书。而自幼读书十分勤奋，在家乡读小学，一直是名列前茅，小学毕业后，我不怕艰苦，敢于负笈走出大山，到丽江读初中，又到大理读高中，学习成绩进步很快。初高中毕业会考都名列第一。

1944年，我到昆明考大学，一连考取几所大学。在云南大学，我考取航空工程系，在西南联大，我考取文学院中文系。因我自幼喜爱文学，又仰慕联大名师荟萃，便舍工习文，进联大中文系读书。受业于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沈从文、李广田、游国恩等文学大

师门下，经他们朝夕教诲，深受教益。特别是联大继承了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五四运动“民主、自由”传统，又正值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时期，师生都很关心政治时事，成了有名的“民主堡垒”，使我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国，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一手撕毁“双十”协定，企图全面发动内战。震惊中外的“一二·一”惨案，使我亲身领受到了血的洗礼。不久又发生李公朴、闻一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惨案，我感到极大的愤慨。

1946年秋，联大复员回北平，我随校上